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五十五號

據民國許鐘璐等修于宗潼等纂
民國二十一年鉛本
影印

山東省

福山縣志稿

(二)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五十五號

據

民國許鐘璐等修于宗潼等纂
民國二十一年鉛本

影印

山東省

福山縣志稿

(三)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應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析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胪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n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序

福山自金源立縣距今已七百年志凡三修一於明之萬厯一於康熙一於乾隆嗣是無聞焉顧萬厯志久已無存康熙志雖間有存者然率多殘缺無完本惟乾隆志邑中故家尙有藏者亦寥寥不過數部嗣是又經百七十八年搜輯而採訪之蓋戛戛乎其難矣光緒十五年奉 旨開會典館于京師徵求各省志書越二年邑令康公乃創修志之舉公舉王文敏牟朵珊謝南川及余爲總纂四人皆宦京師邑中亦未正式開局僅有提調採訪諸人又以絀於經費諸人皆自盡義務不支薪無專責故前後郵寄京師者殊屬無幾幸文敏學問淹博多方攷證成選舉表二卷宦蹟尙未成半數惟節孝一門採

訪者多故稱完備又二年文敏入直 南書房日不暇給朵珊亦出
守柳州又數年南川亦出守曲靖比甲午文敏殉難書多散佚是本
亦多亡失輾轉存縣久已皮置辛丑余讀禮家居邑令李公諄囑繼
辦余展其稿惟碑版一門頗完全其他則毫無依傍乃復求李公派
員採訪李公旋被議去官余亦出守四川又復中輟民國九年四川
王君來令是邦重申前議乃復委人採訪然所採訪終亦無多幸孫
君虞臣習知邑中掌故與之竭力搜羅各門始得略具規模
舍弟宗洵 帮
同纂輯乃得告成然不完不備之處仍不能免故定名爲福山縣志
稿以待後來者之修正云爾

歲在重光協洽涂月下浣于宗潼識

凡例

一天文星野之學久失其傳况區區百里之地而必指定爲入某星幾度殊屬附會惟相沿已久故仍就舊志及府志所載存其崖略一輿圖舊志甚略今於全境縣治二圖外就光緒三十四年所分二十區每區一圖並加烟台商埠一圖焉

一邑俗淳厚故舊志及省志府志皆言風俗之厚擬於鄒魯近自通商以來五方雜處濡染於奢靡詐僞漸漓其真今仍照舊志登列庶後來者尙可考古俗也

一物產一門舊志甚屬寥寥近來前無今有者紛至沓來而竭力製造者尤爲日新月異且爲商務盛衰之所關故登記最詳

一 人物一門按禮部定例必名列鄉賢者方准立傳限制綦嚴然此例當時卽未能遵行今以宦蹟行誼二項爲准除明史 國史有傳數人外其凡見於名人文集及鄉先達之紀載者均採訪從詳焉

一 貞存節烈舊志合爲一門今悉分爲數項以存其實惟年代遠者仍照舊志

一 藝文一門已經刊刻者不過二三十種而殘佚已多其他私家著述採不勝採惟以曾經送局抄錄或雖未送局而見於鄉先達之記載者亦登記焉惟其人尙存仍以昭明文選不登何遜之例置之

一文翰舊志所載已多若循例續增則更無限制矣今無論何人凡有關於本邑掌故者均載餘從割愛

一金石祇載本境之所出古碑自元以前多全載明以後則擇要而登而其稍有關於地方者亦存其目

一賦役舊志所載多沿明代之舊如蒼朮棉花等類甚多其後或裁或併其檔冊久已散失不能悉其源委謹就府志所紀以光緒三年爲止至戶口則自保甲久已奉爲故事其確數萬難攷定故仍照府志存其概焉

一煙台商埠以東海關稅爲最要然自開辦志局以來屢次函詢終皆秘而不宣僅得光緒末年收入之數謹照登載其確否亦不得

而知也

一民國開國至今已二十餘年其官名率與舊例不能畫一政務亦屢有變更前許道尹持論令單列一本以清眉目今謹遵之

一向例選舉表止及五貢而廩增附不入以陸續增加不勝載也今科舉已廢無從再增故另訂黌門錄一本以附于後

初次發起

督修

福

山

縣

知

縣康鴻達

貴州人

福

山

縣

知

縣汪麗金

湖北黃陂人

福

山

縣

知

縣李舒馨

陝西長安人

福

山

縣

知

縣許葉珍

順天大興人

福

山

縣

教

諭劉雲隨

單縣人

福

山

縣

訓

導楊清華

長山人

總纂

監

察

御

史牟蔭喬

翰林院編修王懿榮

翰林院編修謝雋杭

工部虞衡司主事于宗潼

提調

舉人郭學濂

庠生王文泉

庠生張鳴岡

庠生陳傳霖

纂修

庠生鹿伯鋆

庠

生王其侯

採訪

庠

生郭友霖

監

生郭寶琳

舉

人鹿福保

舉

人張士魁

舉

人王恩鐸

舉

人蕭榮田

庠

生孫如友

庠

生劉金釗

庠

生王文川

歲

貢牟照

庠

生王桂芳

二次續成

督修

膠

東

道

尹許鍾璐

山東濟甯人

福

山

縣

知

事王陵基

四川樂山人

福

山

縣

知

事蕭彝元

四川三臺人

福

山

縣

知

事龔積禎

安徽合肥人

福

山

縣

知

事杜偉熙

山東濰縣人

福

山

縣

知

事賈錫璵

河北河間人

總纂

四

川

勸

業

道于宗潼